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征程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下)

(一)

1922年春节,嘉兴南湖上,中共一大红船荡起的涟漪还未散去。一位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年轻人告诉父亲:“我要干共产!”父亲暴跳如雷:“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年轻人回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

2016年春天,一首《马克思是个90后》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作者在歌曲中描绘的“像叶孤舟行在山丘,那样的为真理争斗”的情怀,点亮许多人“为了信仰我们一往无前”的激情。

一个是共产党人李立三,一个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90后女孩。曾经的“1890后”、今天的“1990后”,时隔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客观的真理、都把马克思作为时代的偶像?

95年,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党,为什么能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矢志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不仅将中国送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95年,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曾经历革命失败的惨痛,曾面对一穷二白的困局,也曾走过十年内乱的弯路,又是什么力量,使得它总能从危难中奋起、于困顿中重生,最终带领一个5000年古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西方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惊呼必须“重新发现马克思”;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逆势上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两大“世界历史性事件”,西方和东方都在思考:该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第一大党95年的非凡征程,该如何重新认识那些执着的共产党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和力量?

(二)

一个半多世纪前,摩泽尔河畔年轻的马克思不会想到,他所献身的那些“批判性思想”,会给世界带来真理的光芒,形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力量。

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最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的贡献正在于此。1883年3月,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挚友恩格斯这样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新大陆的发现、运河的开拓、奔驰的火车与轮船,以及欧洲大工业时代的工厂:通红的炉火、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的工人、剥削与压迫,以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那些伴随着电光石火的文字,让一代代读者目睹了“世界制度”的形成与动摇,更唤起从西方到东方整个世界“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激情。在古老的中国,信奉“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的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如今,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已被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两大发现”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揭示了现实的发展道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之所在。

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地“改变世界”。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并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也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慨叹,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每当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危机或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就会“出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因此也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

作为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洞察世界、打开未来的一把钥匙,也提供了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其道路追求的一把钥匙。因为“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伟力,深刻体现在这个东方古国波澜壮阔的百年命运中。

(三)

许多年来,一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二十世纪的中国,所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都被拿来试验过,几乎没有一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为什么唯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

95年前,诞生伊始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当时中国300多个政党中的一个,今天却已成为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无数人把探寻的目光投向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学”成了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显学”,每个月都有大量论文和著作面世,试图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些回答中,最为贴近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概括和论述。“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是78年前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得失做出的深刻判断。“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这是习近平同志立足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依靠科学理论的力量,95年来,共产党人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开创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产党人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依靠科学理论的力量,95年来,共产党人奋斗在真理的道路上,完善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一个“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一个“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的民族,迎来复兴的曙光;亿万“为奴隶,为牛马,为羊犬”的人民,实现小康的梦想。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曾遭遏制、封锁、包围、孤立的崭新国度,以其势不可挡的崛起创造出一种举世瞩目的制度模式,被马克思眼中那些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的人,不无敬意地称为“一个崭新时代的黎明”,让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改写中国命运的政党”,更推动“人类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曾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何谓王道?就是人间正道。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人间正道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

(四)

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但并未终结真理本身。

1991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0多年,印有镰刀、锤子和金边红星图案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而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改旗易帜。

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画像。他甚至认为,自己不适合制定“小餐馆的未来食谱”,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明确无误的状况。或者说,不是一个削足适履的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95年历史上,所遭受的挫折与所赢得的光荣一样多。但即便是最严苛的指责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有超凡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机械的教条,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他们眼里,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不能用一种教条式理论来把握;高速变化的发展和建设进程,不能用一种静态的思路来指导;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不能用一种不变的模式来裁决。再好的理论,也需要根据现实不断创新。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认定,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95年艰辛奋斗,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主线,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提出党应该“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到写入“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从清除“左”的错误走向改革开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根本大法”党章,曾16次修订。95年历经风雨,我们党始终敢于面对挫折、直面错误、总结教训,也从不畏惧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有人说,“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反过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中国大地生根,成为生机蓬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幽默地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历程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五)

时间是真理的忠实听众,一切嘈杂喧嚣都会湮没在时光的尘埃里,一切真知灼见都将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

如果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走出了百年屈辱的命运,显示了真理的伟大力量;那么世界“重新发现马克思”,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所追寻的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

上世纪末,因解构主义而享有盛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郑重推出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这部轰动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德里达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今天,当便捷的交通、发达的贸易和无所不在的网络,让人类社会的每一秒,都像是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中的全球性时刻,人们忽然发现,这个时代竟与《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如此相似。2008年,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华尔街向全世界蔓延,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书店前人们排队购买《资本论》,海报上写着:“马克思所说的都应验了。”

事实是,对金融危机林林总总的解释,都没有超出《资本论》所阐发的基本原理。无论资本主义学者祭起多少“全球化”“信息化”或者“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之类的新鲜词汇,《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和冲突的必然结果都不会消失。《外交政策》杂志一篇带有马克思画像的封面文章写道:“他在一百多年前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这次金融海啸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完全摩登的马克思》。

被西方“重新发现”的马克思,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走出困境的“良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强化对经济的调控,以政府和市场的“双轮发展”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更多国家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对最低工资、劳动时间、福利津贴等作出具体规定,无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和印证。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会对自己所怀抱的真理如此自信。无论是“走近马克思”,还是“回到马克思”,今天的人们正可以从资本主义借重的“马克思的头脑”,从中国共产党践行的“马克思的脚步”,来判断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来思考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六)

在美国学者库恩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同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续写这个“伟大的故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即便预示了全球化图景,马克思也不会想到,一架飞机的生产可以由几十个国家协作完成;即便揭示了社会运动规律,他也不会想到,如此多的人会被虚拟的网络连在一起;即便关注着现代科技进展,他也不会想到,人类的征程已经迈出了太阳系。

95年,中国共产党这个“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让这一理论始终充满活力。当代共产党人需要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去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来自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

2012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成为集体学习的内容。

这是当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运用”。如果不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不掌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不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方法,就不会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不会懂得“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就无法化解前进中遇到的挑战、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就无法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宏大棋局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五位一体”为总体布局、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引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始终是在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国富民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传奇性贡献”,外国观察家曾如此评价。反过来说,把一个人口比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数还多的国家带入现代化,又是多大的挑战?在革命年代,我们相信,依靠真理的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依然相信,依靠真理的力量,可以“创造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

(七)

1852年,潜心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开设专栏,其中十几篇文章论及中国。他借助黑格尔“两极相连”规律预言:如果世界历史的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便是中国,西方世界乃至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命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具有胸怀世界的眼界和抱负。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有责任以独特的政党理念、治理模式和世界意识,丰富人类文明的思想库。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打破了政党活动的历史局限,让世界看到一种与时俱进的政党品格。有外国学者曾经感叹: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国家治理得如此成功,而其精英却在不停反思。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这种“反思”。67年执政兴国,为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政策调整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中国共产党崇尚“自信、自觉、自省”的政治品质,以对自己的“不满”,不断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异化和弊端,提供了一种兼具公平与效率的治理模式。这个6月,全世界都在关注英国公投“脱欧”。然而“脱欧派”胜出之后,剧情却出现反转,超过300万英国人表示“后悔”。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尴尬。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一篇文章,追问“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严重、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构架的政治制度,以其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担当,以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让世界感受“中国温度”、产生“中国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顺应了当今世界的趋势,在新型义利观下,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提出,要构建作为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和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共同体”,它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归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一切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僵化思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逻辑,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推动马克思这一宏大构想,打开了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当中国大幅增进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当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感慨,“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我们想起了邓小平的论断——

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八)

英国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墓地,埋葬着马克思、斯宾塞、法拉第、艾略特等近百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访客常年络绎不绝的马克思墓地。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95年前,在旧时代余晖中,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今天,在复兴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理论与伟大的政党,在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奋斗中,必将写下新的伟大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专题报道

光辉历程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以阜平、五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在取得抗战开始后的首个胜利之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晋西南,而由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及军政干部共3000余人则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华北采用“总力战”,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遍地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1945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

同年8月,晋察冀军区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攻占城市70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从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敌后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族脊梁

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1962年冬,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有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把兰考划给周边四个县。焦书记当时就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50多年过去了,提起焦书记立“军令状”的往事,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仍唏嘘不已。

“焦书记喜欢到基层,喜欢和群众在一起,村里栽树他陪着一起劳动,饲养员喂牲口他忙着掂草……”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干事刘俊生回忆。

1963年冬,焦裕禄冒着严寒叩开许楼村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饥。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老人哆嗦着手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在兰考期间,焦裕禄除了开会,大部分时间都在下乡。焦裕禄纪念馆,存放着他50多年前骑过的破自行车,还有他穿过的胶鞋,靠着这车和鞋,焦裕禄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回忆,焦裕禄平时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焦守凤中学毕业后,本可以找个像样点儿的工作,但在焦裕禄的坚持下,最后她到县食品加工厂的酱菜组“接受锻炼”。

长期的劳累和一再拖延,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1964年春,治河施工时,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焦裕禄,仍然带着县里干部参加劳动,在工地背沙子时几次摔倒。

1964年3月底,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一个多月后病逝,年仅42岁。“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遵照焦裕禄遗愿,人们将他安葬于兰考。

焦裕禄,用赤诚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教育着共产党人。